

不许假洋鬼子借尸还魂

3101 厂 理 论 组

武汉大学中文系74级学员

在中国革命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的历史转折关头，鲁迅“感着时代的心搏”，于一九二一年底至一九二二年初，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完成了《阿Q正传》的创作。

这部作品，是鲁迅对他“所经历过的中国的人生”的深刻总结。它以锋利的笔触，剖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动腐朽的本质，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愤怒控诉了反革命篡权复辟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惨痛灾难，为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历史教训。

小说中的未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盘踞在这里的以赵太爷、钱太爷为代表的地主豪绅，凭着封建政权和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着最残酷、最野蛮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象吸血鬼一样，在阿Q这样的赤贫农民身上敲骨吸髓，盘剥勒索，把他们榨取得一无所有，甚至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这帮凶残狠毒的剥削者不仅时时用“大竹杠”和“哭丧棒”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而且还用杀人不见血的孔孟之道来麻醉他们的灵魂，使阿Q这些受尽凌辱的苦难者迟迟不知觉醒。作品就是通过这形象的描写，鲜明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尖锐对立，揭示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正当广大农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辛亥革命开始了。“革命党进了城”，这消息引起了赵太爷们的恐慌，但却使受尽压迫凌辱的阿Q顿时感到“快意”，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一样”，高兴地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并想尽办法去和革命党“结识”。可是，当他还没来得及找到革命党时，眼前的一切很快又“日见其安静了”。在县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也当了民政帮办。在未庄，除了砸碎了一块“龙牌”以及“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外，全都“样样照旧”。一场风暴就是这么烟消云散了。革命丝毫没有触动赵太爷们的任何利益，更没有触动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鲁迅正是以这种“画龙点睛”的精炼描写，十分尖锐地揭露了辛亥革命的极端不彻底性，并且指出，正是由于领

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投降，从而很快就导致了反动势力的全面复辟。

在《阿Q正传》中，鲁迅还以大量的笔墨刻画了中国反动势力对付革命的狡猾多变的凶残嘴脸。这伙积累了几千年反动统治经验的反动派，反革命嗅觉特别灵敏，随时准备着一套应变的办法。为了共同对付革命，县里的举人老爷刚听到革命党要进城，立刻就“素不相能”的赵太爷排起了“转折亲”，结成了反动同盟。他们十分善于施展两面派的反革命手腕，在革命风声正紧的时候，一方面疏散财物，积蓄力量以便东山再起；一方面又在人们面前装出可怜无害的样子，“怯怯的”低声下气把阿Q尊称为“老Q”，以骗取人们的同情。他们的秀才大爷更加狡猾，一知道革命党夜间进了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触”的钱洋鬼子，喊起了“咸与维新”的口号，相约着去“革命”。

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那个穿着“一身乌黑”的“洋衣”，手里握着“文明棍”的假洋鬼子。这个未庄大地主钱太爷的忠诚孝子，是个地地道道的从公开反对革命而伪装积极革命到恶毒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典型。在未庄，他和他的反动老子一样，享受着封建特权，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不同的是，他进过“洋学堂”，还“跑到东洋去”镀过金，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没有了”。尽管他披上了一件“文明”外衣，而“内骨子是依旧的”。所以常被阿Q骂作“假洋鬼子”。这个家伙，一知道革命风暴要来临，立即就把回国后又“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上”，凭着一套从洋鬼子那里学来的“新本领”，很快就混进了革命队伍，挂起了“银桃子”的徽章，成了未庄第一号的“革命人物”。这样，未庄的反动势力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挂着革命招牌的“头面人物”，篡权复辟活动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秀才大爷靠着假洋鬼子的“介绍”，花了“四块洋钱”混了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依然到处耀武扬威。反动透顶的赵太爷也因此“骤然大阔”，变成了“革命”的老太爷，继续在未庄横行霸道。假洋鬼子不仅为赵太爷们的篡权复辟打了头阵，而且由于他善于自我吹嘘，伪装革命的本领，所以使他在破坏革命、扼杀革命方面，也起到了赵太爷之流起不到的作用。当“想造反”的阿Q满怀希望到他那里要投奔革命党时，不正是由于受到他“不准革命”的“哭丧棒”的挥斥，从而感到“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么？

假洋鬼子这种人物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他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濒于崩溃的特有产物，是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以利于他们的剥削，而特意孵化出来的一批“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奴才。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反动性，但比起拖长辫穿马褂的赵太爷们却又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鲁迅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力，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他敏锐地看到了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带来的斗争新特点，看到了假洋鬼子这类敌人对革命事业的极大危害性，因而及时地揭露他们反动丑恶的嘴脸，告诫人们对他们要百倍地提高警惕。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拥有着强烈的战斗意义。

鲁迅曾经说过：“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三闲集·华盖集》）辛亥革命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封建复辟势力的“潜入”而被葬送的。而反革命的复辟也就必然要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人头落地的惨痛灾难。鲁迅在《阿Q正传》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给我们描写了这种血淋淋的画面：当知县老爷和举人老爷们篡权后，就以百倍的疯狂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扑，他们把拖欠举人老爷陈租的佃户和许多无辜的群众抛进监牢，对于要造反的阿Q，更是动用了全部的专政手段，竟出动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深夜严拿，又是公审，又是游街示众，直到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强加的罪名却是扰乱社会治安的“强盗”。他们说道，这是“惩一儆百”，以显他们这伙“革命党”上台执政的“功绩”。反动复辟势力的凶残狠毒，阿Q人头落地的惨痛教训，是值得我们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啊！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面前，鲁迅痛感阿Q的不觉悟，不能彻底挣脱统治者的精神枷锁。因此，尽管他深受压迫，可长期以来对革命却有一种传统的偏见，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后来，由于被赵太爷们逼向了绝境，终于喊出了“革这伙妈妈的命”的反抗呼声，但对革命还是缺乏正确的理解，在迸发阶级仇恨时总是掺杂着许多报复心理。因而，使他分不清敌友，把小D和赵太爷一样都看作是“第一个该死的”敌人。以往，他对假洋鬼子是深恶痛绝的，可一旦看见他挂起了“银桃子”的革命招牌，也就丧失了警惕，甚至还把他当作革命党去投奔。结果，不仅革命不成，反被挂着革命招牌的“长衫人物”绑赴上了刑场，糊里糊涂地摔了脑袋。虽然，阿Q在被杀害前的一刹那，思想出现了“旋风似的”震动，感觉到有一群比狼“更可怕”的东西“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可是，这种朦胧的意识，终于挽回不了他悲剧的命运。在阿Q身上，凝着鲁迅期望群众早日觉醒的殷切希望，正如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所说的：他希望“在将来，困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真正觉醒，才能够把这几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彻底捣毁。

《阿Q正传》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血泪史，也是鲁迅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虽然，阿Q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社会主义时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假洋鬼子这个形象中，我们不正是可以看到走资派的某些面影么。工人、贫下中农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要革命，而走资派却不准革命的矛盾不正在发生而且将继续存在，直到阶级消灭之时么。所以，我们应该牢牢记住鲁迅从阿Q悲剧中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要不断提高对反复辟斗争的认识，增强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特别要警惕革命队伍中的“假洋鬼子”篡权复辟的罪恶阴谋，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两篇选自《永远进击——鲁迅反复辟反倒退反投降的斗争》一书）